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薛添仁

摘 要:毛泽东根据近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形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批判吸收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攻坚则韧,乘瑕则神”、孙臆驱马之法和中国古代其他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并结合自身长期作战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积极防御理论、持久战理论、游击战理论等军事理论,为人民军队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军事战略战术,成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传统;军事战略;军事战术

DOI:10.14130/j.cnki.mzr.2023.05.005

在近代中国革命战争中,面对敌强我弱的总态势,毛泽东研究制定军事战略战术的关切点是明确的。一方面,是如何正确认识战争规律、掌握敌我双方情况,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不同战略阶段防御和进攻的次序与关系,进而明确弱军反攻的战略时机、突破口及步骤安排问题;另一方面,是采取怎样的军事战术建立起局部优势,并逐步积累转化上升为整体战略优势的问题,从而从这两个方面将战略上的劣势转化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在研究制定军事战略战术的过程中,毛泽东广泛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

思想,抓住近代中国社会新要素、近代中国革命新要求、近代中国战争新动力,结合在长期指挥人民战争中的经验创造,提出了一整套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战略战术,成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一、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学习

毛泽东酷爱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喜爱分析古代军事战例、研究传统军事书籍和阅读包含描写战争的古典文学名著。在毛泽

作者简介:薛添仁,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CKS020)。

东的军事著作或讲演中,可以发现他经常大量“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①来说明和分析军事形势和阐释军事战略战术问题。

(一)从古代战例军史中学习军事战略战术

自古以来,军事战争的胜败对国家政权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②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中蕴含着大量的军事战争,有人把《左传》形象地称为“相斫书”,而毛泽东则把记载战争更多的《资治通鉴》称为一部大的“相斫书”,并称赞其“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③。毛泽东正是从古代大量的“相斫书”中吸收了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加以运用和创新。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战争的过程中,尤为重视对农民起义战争的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主力军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农民。毛泽东仔细研究了“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④,对古代历次农民起义的得失和经验教训都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从而使得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能够克服

流寇主义、盲动主义等各种错误倾向,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而陷于失败。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战争的过程中,特别关注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战争的特点之一是长期在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下进行。为此,毛泽东仔细研究了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⑤等中国战史上弱军战胜强军的著名战例,为其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指挥经验和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而创立一整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战略战术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战争的过程中,还注重丰富扩充军事地理知识。他特别关注古战场、要塞等军事地理方面的内容,十分重视对地方志的搜集和阅读。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以下简称“湖南一师”)期间就阅读了顾祖禹编撰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全书“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以地势论战争胜败,又以战史述地理形势。1970年,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同他谈话时向他推荐这本书:“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⑥可见毛泽东对军事地理的高度重视,以及阅读古

①[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4页。

②景有泉、迟力主编:《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③景有泉、迟力主编:《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籍时对军事地理方面的具体关注点。事实上,毛泽东在革命战争的关键时刻能选择正确的行军路线、制定恰当的军事计划并根据具体的地理形势灵活地运用军事战略战术,正是得益于他在阅读古代历史战例时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地理知识。

(二)从传统理论典籍中学习军事战略战术

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战争和总结战争经验时,不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还高度重视古代兵家典籍中对军事战略战术的理论阐释,并从《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老子》《庄子》《管子》等书中直接汲取或间接总结出指导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毛泽东对传统典籍思想的理解是本质的。他可以做到融会贯通,能从哲学著作贯通到军事理论。例如,面对红军主力是否应该突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重兵包围和封锁时,李德回忆称毛泽东“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①。毛泽东引用《庄子》与当时的军事形势有关。他认为,庖丁在解牛时避开骨头筋脉,只顺着牛身体内的缝隙穿插解剖,因此用了19年刀刃还锋利如初。军事作战也如同解牛,特别是以弱军之刀对阵强军之躯,绝不可以刀对骨硬碰硬,而是应当避开敌军的强硬主力,善于从敌军两个部队中间的缝隙穿插、分割、包围,进而寻求战机歼灭敌军。

毛泽东对传统典籍思想的吸收是批判性的。他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审视传统典籍,辩证吸收其中的合理内核。毛泽东熟读兵书但不迷信兵书。他曾对郭化若说:“要深刻地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孙子兵法》。”^②毛泽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注重考察兵书成书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理论源流,把古代兵法同当时的军事战争和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考察;同时,又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之进行批判总结,并结合自身革命战争实际经验赋予其新内涵,从而为我军制定了一整套指导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战术。

毛泽东对传统典籍思想的运用是创造性的。他虽然注重从中国古代兵家典籍中学习研究军事战略战术,但同时也提出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③。毛泽东这里所说兵书“少读为佳、略通可以”是指多读兵书容易受到既有军事原则的束缚,容易从书本出发而不是战场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战术。与军事教条主义者相反,毛泽东提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和战略战术,更为看重军事战争中的经验创造。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曾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馀论故智者乎?”^④大意是:孙武

①[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4页。

②《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③《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页。

虽然写了《孙子兵法》，然而他在指挥作战时却犯了《孙子兵法》规定的军事原则。孙武靠自己能力写的《孙子兵法》尚且不能熟练运用，更何况那些只知道学习《孙子兵法》旧有理论计谋的人呢？可见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已明白只从军事书本上学习军事理论用以指导战争并不可靠。只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真正领悟军事战略战术的奥秘。

（三）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学习军事战略战术

毛泽东不仅注重从古代战例和传统典籍中吸收军事营养，也善于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军事智慧。毛泽东一生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长征前，为了方便部队转移，总部命令扔掉不必要的东西。毛泽东坚持带一铁皮箱子的书籍并坚称：“三国演义、水浒，还有一些唐宋诗词，路上拣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①

毛泽东阅读古典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善于将简单故事上升到军事和哲学层面思考，并注重结合正规史料考证文学故事的真实性。毛泽东指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还不够，还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小说。他曾坦言《三国演义》算是他“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②，并称赞《三国演义》《水浒传》所描述的战例蕴藏着很深的战略战术和辩证法，可以从中学习如何布置兵力，像诸葛亮空城计等故事就“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③。即便像《封神演义》这种虚幻的神话小说，毛泽东也能透过书中那些眼花缭乱的神仙法术提炼出集中兵力和

优待俘虏等军事原理。然而，文学故事难免存在夸张、虚构和张冠李戴的情况。对此，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结合资料多方查证，以力求更为准确地理解当时军事战略战术运用的历史情境。

毛泽东阅读古典文学的另一大特点在于注重联系实际，善于借助文学典故说明现实战争问题，运用其中经验智慧育人育己。有人曾向毛泽东请教说，自己虽然也看过一些文学作品，但很容易遗忘其中的情节。对此，毛泽东回答道：“为什么记不清楚呢？要想记得清楚，看书就得讲究方法。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事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④在需要向军事理论基础薄弱的军队干部解释作战计划时，毛泽东靠的不是玄奥的兵法原理，而是通俗易懂的文学故事。这种用家喻户晓、贴近大众化思维和语言的故事向广大红军干部讲解军事战略战术的方法，对于强化他们对作战计划的理解、支持和决心，直至最终顺利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继承

毛泽东在充分吸收孙臆驷马之法等战术思想基础上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原则；在充分吸收《管子》“攻坚则韧，乘瑕则神”等战略思想基础上提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战略方针；同时继承吸收了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五瓣莲花

①郭晨：《万水千山只等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②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③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④陶鲁笏：《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抄尾阵等其他战术战法。

(一)对中国古代集中兵力战术思想的汲取

集中兵力战术是毛泽东指挥作战中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基础战术。“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①。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战术的理论,是在充分吸收中国古代军事战术思想并用之总结我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

冯梦龙在其编撰的《智囊》一书中曾收录了田忌赛马的故事,并在其后加编了这样一段话:“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②毛泽东对此高度赞扬并在旁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③毛泽东还仔细研究过古代著名的以弱胜强战役,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④。

在充分吸收孙臆驷马之法等军事思想

基础上,毛泽东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⑤战术原则。在游击战中,毛泽东指出具体要领是“派遣少数人枪,在不易攻击的方面举行佯攻,钳制敌之一面,而以主力投入敌人薄弱较易冲击的一二点”^⑥。其中,派遣少数人枪佯攻钳制,即是“以弱当强”;以主力冲击敌人薄弱部分,即是“以强当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规模运动战中,毛泽东对“集中优势兵力”的“优势”进行了定量说明:“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⑦这就使得这一战术原则更加量化清晰了。

在运用这一战术时,应注意“优势”是一个相对概念。这就要求,一方面把我军兵力集中起来作为攻击敌军相对较弱一部的的主力;另一方面则派出少数部队牵制敌军主力,或通过各种战术计谋调动敌军诱使其分兵。毛泽东指出:“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钳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⑧

在运用这一战术时,还要考虑敌军大量集结在一起,我军无法集中起相对它更为优势的兵力的情况。此时就要采取“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⑨的战术方针,派遣小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②《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③《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7页。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页。

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页。

部军队正面监视钳制敌军主力的同时,另外视战场具体情况或集中兵力或分兵几路大踏步运动至敌后,迫使其后撤回救、分散配备,从而抓住战机各个击破。

在运用这一战术时,还要考虑敌军将集中兵力战术反施之于我方的情况。1949年我军在追击白崇禧余部时就曾遇到过。此时,争夺行军主动权就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我军仍要采取集中兵力战术,且作战视线不应被敌军运动干扰吸引,而应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完全主动作战方针,集中力量进攻敌方要害敏感之地,迫使敌军运动至我军欲使其运动到的位置,依靠所掌握的行军主动权和自由权在有利于我军的时机和位置决战并消灭敌军。

(二)对“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思想的吸收

敌军内部分为各个集团、部分,这些集团和部分的实力是不平衡的,是有强弱之分的。“一根筷子易折,一捆筷子难断”,然而对究竟先折哪根“筷子”,集中兵力后先歼灭哪股敌人却容易产生争论。毛泽东在充分吸收古代“攻坚则韧,乘瑕则神”等军事战略思想基础上,结合自身长期作战经验提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战略方针。

1931年,国民党分兵四路向中央苏区进犯并发动第二次“围剿”。其中,从北面进犯的王金珏部、孙连仲部和朱绍良部相对较弱,从西南进犯的蔡廷锴、蒋光鼐统率的第19路军则军力较强。当时有人主张先打第19路军,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先打较弱的王金珏部,并从西往东推进,依次打孙连仲部、朱绍良部,最后在建宁一带建立根据地。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会后,毛泽东

同人闲谈时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①

事实上,第二次反“围剿”中敌我双方形势正是按照这一规律演化的。毛泽东率军首先攻打实力较弱的王金珏部,消灭了王金珏部的公秉藩第28师,随后向东推进,依次歼击王金珏部郭华宗师、孙连仲部高树勋师、朱绍良部胡祖玉师,并最终在建宁县城歼灭朱绍良部刘和鼎师三个团,攻克建宁县并在此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在整个过程中,第19路军未与红军主力有过实质性的接触。当第19路军获悉王金珏部在富田受到重创,他们立刻赶往富田增援。而当他们到达富田后,我军已经歼灭孙连仲一部并转移至建宁一带,于是第19路军又匆匆赶往建宁解救被包围的朱绍良部。当他们向东才走了一天就接到总部情报说朱绍良一部已被打垮。此时敌我强弱形势已发生扭转,第19路军因担心在其赶往建宁的途中被我军设伏歼击,所以不再敢贸然东进。最终蔡廷锴不得不率军掉头折返富田,随后又因害怕红军主力折返富田并配合当地赤卫队对其取包围之势,又由兴国撤至赣州。最终,实力最为强劲的第19路军竟以“不战而败”的方式灰溜溜地离开战场。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若我军先“攻坚”与第19路军作战,那么实力较弱的其他部队这一“瑕”就会因为我军不能迅速歼灭第19路军而争取到增援时间,就会因为我军与第19路军作战疲劳、攻时过久且面临敌军多方向的进攻更加疲

^①《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于应付而变得“坚”起来。相反,我军先“乘瑕”歼灭其他较弱部队,第19路军就会随着其他部队不断损失而逐步变为孤军,由原来“坚”的优势地位逐步变为“瑕”的劣势地位,最终因畏战而放弃战斗并撤退。这就是“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所揭示的军事战争中敌我双方攻守强弱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毛泽东在吸收“攻坚则韧,乘瑕则神”等我国古代传统军事战略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先占乡村后取城市、先攻取中小城市再打大城市、先打弱小孤立之敌再打强大集中之敌等作战要求,成为十大军事原则的重要内容,成为我军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三)对中国古代其他战术战法的继承

声东击西。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①我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之所以屡试不爽,除了指挥得当,更多是因为根据地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从而很容易造成敌我双方信息不对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②

围魏救赵。毛泽东曾对孙臏围魏救赵战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③他在论及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防御问题时也阐述了这一战术:“如果敌

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④即是说,敌军虽被引至有利于我军的根据地内,但因其实力过大或根据地面积太小,致使可供我军游击回旋的余地不足,此时我军就应立刻改变战术,跳出我方根据地而向敌军据点进攻,通过围“魏”(敌军大本营)救“赵”(我军根据地)的方式打破敌军进攻。

五瓣莲花抄尾阵。该阵法为战国军事家吴起所创。《吴子兵法》曰:“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五军交至,必有其利。此击强之道也。”^⑤该阵法因形似五瓣花瓣围绕花心展开,故名为“五瓣莲花抄尾阵”。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谈到太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还有个歌诀:‘前面一支先扎定’,后面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大意是左右两支兵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敌后,截断敌人归路,这就是抄尾,还有一支兵为预备队,共五瓣莲花”^⑥。事实上,毛泽东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能以弱胜强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并活捉张辉瓒,正是得益于这个阵法的运用。

三、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超越

研究军事战略战术问题,首先必须正确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492页。

③《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页。

⑤[战国]吴起:《吴子兵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⑥《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认识战争规律,掌握敌我双方情况和全部活动;其次,以此为基础处理好不同战略阶段防御和进攻的次序与关系;再次,在敌强我弱战略态势下,需采用游击战作战方式避开敌众我寡的战略劣势、发扬小股部队灵活机动的战术优势,通过对敌军的钳制、干扰和破坏以配合运动战和攻坚战。因此,毛泽东在吸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思想内核基础上系统论述了研究战争的方法论问题;他认真研究我国历史上大量以弱胜强的军事战例并充分吸收其中“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军事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和持久战战略理论;毛泽东在批判吸收我国古代游击战术战法基础上,还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在军事史上第一次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高到战略层面加以考察。

(一)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论断的创造性阐释

毛泽东曾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①毛泽东把战场上变幻无穷的战略战术概括为一句“知己知彼”,可见他对这一论断的推崇。毛泽东在吸收其思想内核基础上进一步从战争规律存在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等角度对这一论断作了创造性阐释。

关于战争规律的存在论。毛泽东指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②毛泽东认为,尽管指战

员在战争中似乎可以发挥自由意志,然而仍然受到战争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战争的本质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实践活动,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同样受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因而战争取胜的关键就在于“知己知彼”,明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情况,通过主观指导创造局部优势和主动,并尽可能地掌握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和战争主动权,从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

关于战争规律的认识论。战争规律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能够通过人的实践认知并加以运用。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③。指战员也需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从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实际着手,通过调查、侦查等多种方式了解敌我双方具体情况。认识和学习战争规律并非终点,使用这一规律指挥作战才是根本目的。“知己知彼”重在研究和学习,“百战不殆”则重在使用和作战,因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也就是包含认识战争规律和运用战争规律两个过程。

关于战争规律的辩证法。毛泽东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49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说的是作战的双方。”^①毛泽东这里引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的目的在于强调认知战争规律需要全面系统,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要有清晰的把握和了解。如果只了解敌军或我军的一方,只“知彼”或只“知己”,那么就会对战争形势作出错误判断,就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②。

(二)对中国古代后发制人战略思想的丰富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广泛研究了古代军事战例和理论,充分吸收其中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并结合作战经验提出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理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积极防御战略理论上进一步提出持久战理论,指明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经验时指出:“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③毛泽东还结合史例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以弱胜强的战例,都是“弱者先让一步,后

发制人,因而战胜的”^④。

在充分吸收“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后发制人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积极防御第一个环节是战略退却。毛泽东指出,同林冲棒打洪教头一样,面对敌军来势汹汹的优势进攻,必须避其锋芒,通过诱敌深入将其引至我方根据地内,利用根据地内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熟悉的地形条件以发现或者造成敌人弱点。当敌军自身的整体优势逐步降低为局部劣势时,战略反攻,即“击其惰归”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实施积极防御战略还需要正确处理人地得失的关系。有人曾质疑实施战略退却放弃我方根据地会“打烂坛坛罐罐”,毛泽东引用《战国策》的名言答复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⑤失地是得胜的必要手段,反攻是退却的最终目的。战争的关键在于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非占有或保守土地,这正是积极防御战略的精髓所在。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积极防御战略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持久战战略。面对日军的全面进攻,中国军队不仅要在局部战役层面实行积极防御,而且要在整个战略上实行积极防御,即大规模地从中国东部地区城市撤出,不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迫使日军为把守城市而分散兵力,进而利于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同土地革命战争的多次反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1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20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

“围剿”不同,抗日战争的积极防御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这相较于土地革命战争多了战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这是因为我军实行战略退却后,敌军绝对优势不会马上下降为绝对劣势而只是下降到相对优势,我军绝对劣势不会马上变为绝对优势而只是上升为相对劣势。日军不能迅速灭亡中国,我军也不能迅速消灭日军,从而陷入了一个僵持的状态。于是战略相持阶段就来到了。这一阶段重要,因为它是敌我优劣势转变的枢纽所在。在战略相持阶段,我方必须采取“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①的战略方针,在日占区发动广大的敌后游击战,逐步削减敌军优势,改变我方劣势,为战略反攻阶段奠定基础。

(三)对中国传统游击战术思想的发展

游击战在近代中国革命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毛泽东称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战胜强大敌人的重要斗争形式。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着数不胜数的游击战术战例。毛泽东在长期军事作战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中国古代游击战术的合理内核并对其进行完善发展,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游击战理论,在军事史上第一次把游击战从战术高度提高到战略高度进行考察。

毛泽东在吸收中国古代游击战术的基础上,结合红军作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是游击战中的退却防御环节。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向指战员们说道:“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

年交道,总结出—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②正是受到朱聋子“打圈子”战术的启发,毛泽东结合上井冈山后打了两次败仗的教训提出了“敌进我退”的战术原则。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弱小的红军不要直接与强敌交战拼消耗,而要首先实行退却,采取“打圈子”的方法避战以寻求战机。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游击战中的反击进攻环节。毛泽东并没有像“朱聋子”一样止步于只避战而不交战,而是积极寻求机会甚至人工制造战机以消灭敌军。游击战中要消灭敌军,袭击和埋伏是基本作战方法。毛泽东说:“《三国演义》中,多处讲到偷袭、打埋伏。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可以不可以用偷袭、打埋伏,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找它的腰部或尾部打?”^③毛泽东还指出,对于驻扎的敌军更多地应采取袭击的战术,而对于运动的敌军更多地应采取埋伏的战术,并进一步提出包括12条如何进行“敌驻我扰”和18条如何进行“敌疲我打”等在内的战术原则。

在游击战中,如果兵力不足或战机未到,袭击与埋伏的胜算把握不大,则不应着急进攻敌军,而要充分发挥游击战的干扰和钳制作用。此时,设疑兵之计以虚张声势就是一种常见方法。三国时期,孙策曾因久攻王朗不下就在其驻地外“各门燃火,虚张旗号,设为疑兵”(《三国演义·第十五回》)以吸引王朗发兵出击。毛泽东学习了这种疑兵之法,指出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可以“在敌人驻地附近多插旗帜,多举烟火,即古人所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227页。

③李慎明:《纵马湘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谓设疑兵的办法。目的或在欺骗敌人,便于我方在他处之行动,或在恐吓敌人,增加其惊惶心理”^①。

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时,还进一步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高到战略层面加以考察。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都意识到面对强大的小国侵略弱弱的大国时,必须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然而,日本却提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图谋,意在变中国侵占区为日本本土区,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小国侵略大国这一事实,瓦解我方持久战方针的战略基础。对此,毛泽东提出要发动深入敌后的游击战争打破日军企图,将日占区的民力和资源组织起来,以偷袭、埋伏等方式对日军发

起广大的游击战,迫使日军抽调大量兵力维护侵占区的“治安”,从而使其正面战场的兵力因不能有效集中反被我方集结的相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因此,游击战争便构成了我方进行持久战的战略基点,使得其脱离了一般的战术范畴,“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②。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游击战术思想的超越。

(责任编辑:张颖)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